

CUNZAI YU XUWU
20 SHIJI ZHONGGUO CUNZAI ZHUYI
WENXUE LUNBIAN

杨经建 著

存在與虛無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

CUNZAI YU XUWU

20 SHIJI ZHONGGUO CUNZAI ZHUYI
WENXUE LUNBIAN

杨经建 ◎ 著

存在與虛無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兆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杨经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

ISBN 978-7-01-009985-9

I. ①存…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6002 号

存在与虚无

CUNZAI YU XUWU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

杨经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350千字

ISBN 978-7-01-009985-9 定价:4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与存在主义的“诗之思”	1
第二节 “非理性的僭妄”与不合时宜的创作	19
第一章 必然性:存在主义东渐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可能性	29
第一节 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遇合	29
第二节 存在主义在中国的承前启后者——王国维	42
第三节 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存在主义价值选择	48
第二章 本土性:在东方语境中通融与重构的存在主义文学	64
第一节 由个体存在的焦虑转化为民族生存的忧患	64
第二节 从反社会性的生命哲学嬗变到以和谐为准则的 生命诗学	80
第三节 将绝对的超越性置换为相对的世俗化	110
第三章 世纪性: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轨迹和流变进程	135
第一节 20年代前后:文学与个性独立	135
第二节 30、40年代:文学与自由选择	145
第三节 80年代以来:文学与生存体验	160
第四章 展示性: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	195
第一节 以“荒诞”和“孤独”为内核的主题话语	195
第二节 “归家诗”式叙事范型	217

第三节	象征化的创作思维·····	236
第四节	反崇高化的(准)悲剧风格·····	259
第五章	边缘性: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文学思潮 ·····	282
第一节	怀疑精神与否定意识对主流文学“现代性”叙事的背离·····	282
第二节	艺术救赎功能难以适应主流文学的文化建构使命·····	297
第三节	悲剧性品质不符合主流文学的审美基调·····	312
参考文献	·····	331

导 论

第一节 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与 存在主义的“诗之思”

一般认为,存在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克尔凯郭尔以个体本位论和宗教信仰为基本特征的神秘主义哲学,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海德格尔、萨特也包括雅斯贝尔斯则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将存在主义发展到成熟或经典形态。对存在主义进行知识话语谱系上的爬梳与系统性检视已超出了本书的阐释范畴,因为存在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文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话语表述形态,诚如鲁迅先生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所说的:“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就其各自所属的话语知识类型而言,文学主要是一种情感话语,具有描述性、形象性和暗示性等特点;哲学则更多地属于反思话语,具有陈述性、抽象性和自明性等特点。要言之,存在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本身便呈现出难以直接对应或通约性。其状犹如20世纪初西方的科学精神或科学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创作观念上,在文学实践上的反映便是以“求真”为是取的写实主义文学现象的生成。更何况,存在主义文学一旦本土化,它已不再是由西往东的移植而是对20世纪中国已有的哲学、文学话语资源整合、重构基础上的“新生”。

笔者以为,以存在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关系的本质观之,从存在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潮着眼是一个既简明又合理的学术切入点。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哲学诸多的话语概念,如存在主义的本体论(存在论)、存在主义的实存状态观、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观、存在主义的在

世关系论等,只有将它们置于西方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义这一特定语境中,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之所以然或为何之所以然。

一代文学巨匠鲁迅就认定“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①,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对其产生影响的‘世界之思潮’、‘外国文学潮流’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易卜生为代表的以个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理性哲学思潮;二是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为代表的标举‘体验’的现代人文学哲学思潮;三是以杜威、罗素等人为代表的重实证的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即‘赛先生’。虽然后来的发展表明,个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占据了压倒性的主流地位,但就五四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的深广度而言,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现代人文学哲学思潮的影响更明显、更深远,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鲁迅所指的‘世界之思潮’、‘外国文学潮流’,主要指的就是这种现代西方非理性文学思潮”^②。

所谓“标举‘体验’的现代人文学哲学思潮”,亦即西方现代非理性的人本主义。

哲学的本质就是从根本上关注人的生命,探讨人的命运,昭示人的前途。在西方,古希腊人把哲学视为“爱智慧”的学问,爱智慧也就是追求和护持智慧。智慧其实就是将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为一体的人的最丰富、最深邃的“思想”。柏拉图说过,哲学起自于人类对自然的惊异,起源于求知的欲望。人的一切活动都有两个指向和目的,一方面,弄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属科学,另一方面弄清人同世界的关系,属哲学,即哲学是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反思,其本性是要解决人自身生存的各种问题,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自由与必然的问题,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从总体上解决自由与必然的问题,寻求人类安身立命之努力——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就是哲学的本性。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② 朱德发等:《非理性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北方论丛》2003年第4期。

问题在于,古希腊哲学以降,哲人们一直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并从人的理性与思维中推论出一切。“整个西方哲学发展,从苏格拉底开始,无论从原因推出结果,还是从结果推出原因;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逻辑推演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其在人类思维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及在人类生产劳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逐步嬗变为人类思想的目的和主宰。”^①

哲学思维方式是人类思想成果最集中的体现。它以理论的形式表达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从古希腊哲学产生迄今的两千多年,哲学思维方式大致经历了从古代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到近代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再到现代人文论的思维方式。无疑,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就是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

法国哲学家夏特莱在《理性史》中讨论的首要问题是:“理性是思想中固有的东西还是被发明出来的。”^②从词源学来看,理性来自希腊文的“逻各斯”,其本源意义是指规律、道理。或,理性是指人们凭借心灵和思维来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和本质——一种借助于清晰概念和逻辑推理来把握事物本质的整合性思维。而本体论思维是随着理性主义哲学一起产生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称本体之学是哲学的第一范式。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都一直遵循着“第一范式”的原则,它从对感性的、具体的东西的追问到对抽象问题的理解,最终以普遍性概念为事物之根底。这是一种以“主体—客体”思维模式为前提的追根问底的方式。在追求永恒的、绝对和普遍的世界本原的过程中,传统的本体论或本质论是一种典型的理性主义思维形态。由于如此,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史实则是一部理性发展史,特别是近代唯理主义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更是把理性推崇到了人类本质的地步,所谓“我思故我在”。黑格尔甚至认为,人类理性和宇宙本体理性是直接同一的,包括自然、人的精神和社会历史都无条件地受理性支配,理性成为一种精神实体和价值结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

① 章忠民:《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② 转引自朱德发《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0页。

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①。

“实际上,非理性无论是作为一种人的内在性精神结构,还是一种认知方式,几乎与理性同时被人们所察觉,其历史几乎与理性同样悠久,只是其意义长期被理性所遮蔽而没有像理性那样全面展开而已。”^②毋庸置疑,理性主义一方面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统治的社会犹如一架机器,人也成了“单向度的人”。^③个体成了机器上的零件,人类失去了精神家园。举凡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精神理念的瓦解,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动摇了理性社会的信念,打破了理性万能的幻想,“这种对理性普遍失去信念的社会背景必然导致了理性主义哲学的危机”^④。

显然,西方现代哲学的转向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从追求彼岸的绝对的、纯粹的自然存在到关注此时此地的人的现实生活,现代西方哲学不满足于以抽象概念为依据而转向现实性,认为任何在场的现实事物都是应该思考和关注的焦点,而不必到事物背后找东西。由是,现代西方哲学观念变革的关键在于哲学关注的对象从自在世界向意义世界的转化,是哲学思维方式从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向属人的、实践的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向,一种哲学范式的更替。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更是人文意义的转向,它以价值意义、主体间性等重要范畴为支撑和指向。须知,人文领域是一个意义领域,赫舍尔说:“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dimension)是做人所固有的……正像人占有空间位置一样,他在可以被称作意义的向度中也占据位置。人甚至在尚未认识到意义之前就同意义有牵连。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页。

② 朱德发等著:《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3页。

③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④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然性。”^①对“意义”的追求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对实证主义唯科学观的批判:把哲学从自然科学范式的统治下解救出来,从而恢复了哲学对人类生存意义进行思考的本性。如果说价值意义是哲学作为人文知识的前提,那么体认这种人文价值意义便是把握具有如此意义的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基本手段,这是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区别于科学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在传统西方哲学中,哲学家们始终把自己的理论思考定位于主、客关系的维度之中。在古代,其宇宙本体论是以客体性为自己哲学的坐标中心;在近代,其理性本体论又以主体性为自己哲学的坐标中心。而无论是古代西方哲学还是近代西方哲学,都是以主、客关系而非主体间关系为理论轴心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堪称人类哲学史上的又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则纷纷从主、客关系走向主体间关系,从近代的主体性走向现代的主体间性:不是“非我”和“自我”,也有别于“我一他”和“我一你”本体论学说,而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哲学范畴成为现代哲学家们关注的重心。质言之,现代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表达了人文领域的个体性、偶然性、主观性现象的可沟通性和可理解性,它使人文科学的哲学逻辑统一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正是意义(价值)、理解、主体间性勾勒了哲学层面的人文内涵。

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人文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它标志着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对象、功能和本质的全面而根本的转向。而在其特征上,则表现为对本体论的解构、对认识论的意义追问和对自然科学基础的诘难。对传统本体论解构的实质是反对古代哲学对人类生存、人类现实生活意义遗忘的倾向,力图把哲学重新引回到关注现实生存的轨道上;对认识论的意义追问的实质是反对近代哲学为认识而认识的哲学观,致使对认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的追问切换到以意义论的方式追询人的生活世界的具体性;对自然科学基础的诘难的实质是要摧毁自然科学成为一切科学的“方法典范”,以期将哲学的人文基础从一种方法论迷失或世界观迷失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从而着手改变传统哲学的基础和方向。

^① [美]A. J. 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

不言而喻,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促成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形成。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最初以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最为突出。他们认为理性主义本体论或本质论从主、客二元分立的视角进行的研究都只能及于现象界而无以通达人和世界的存在。为了揭示后者必须超出二元对立,超出理性的界限,转向非理性的直觉与意志。克尔凯郭尔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对立起来,特别是把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当作自己哲学的根本方向。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逻辑必然性当作实在的统一性的最高原则以及理性和实在的统一性的保证,并由此而陷入了“客观主义”。世界无非是客观精神的必然显露,一切具体的、特殊的存在是这个普遍存在的实例,是这个整体中的某一阶段中某一成分。这样,人实际上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失去了作出决定和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从而也将使自己忘却了对发生的事件的责任,取消了个人从伦理上对待自己和世界的可能性。黑格尔哲学是一种用思想整体来牺牲个人、使人非人化的哲学,是对人的地位和尊严的一种蔑视。克尔凯郭尔由此断定哲学研究的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个人的“存在”,他以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取代客观物质和理性意识的存在来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以个人的非理性的情感,特别是厌烦、忧郁、绝望等悲观情绪代替对外部世界和人的理智认识的研究,特别是代替黑格尔主义对纯思维、理性和逻辑的研究来作为哲学的主要内容。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把意志同理性完全对立起来,从人的非理性方面寻求万物之本,认为非理性的意志是世界的本体和万物的根源。与西方古典哲学相比,生存意志论从人的情感意志出发与非理性主义从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出发在哲学基本倾向上是一致的。生存意志论探索人和世界真正的内在本性,关心人的前途和命运,维护人的价值和使命,要求哲学摆脱外在的虚幻世界的诱惑,回复到内心世界中去研究人和人的意志,它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主义的开端。受其影响,尼采的“超人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在德国、法国兴起的广义生命哲学思潮成为19世纪后半期非理性主义的重要思想流派。

尽管不同的生命哲学理论存在着某些话语表述上的差异,但其共同之

处是显而易见的。生命哲学家都赋予生命的本质以本体论意义。他们不是把生命视为物质或精神的实体,而是看作一种富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活力。他们认为,哲学所应探索的不是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而是内在于并激荡着整个世界的生命创造力。此外,生命哲学家都强调“生成”和“创造”。由于生命的本质是一种富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活力,因此,生命哲学家提出了与传统哲学不同的世界观:他们批判传统哲学的静止孤立、非连续性和机械性的世界观,认为生命本质是活动,活动本质是自由创造,而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整体。所有这些都彰显了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本色。在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人本思潮发展过程中,生命哲学的地位后来逐渐被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论或生存论哲学所取代。由海德格尔开启的以存在本体论为标志的人本主义对人之本真存在进行了探讨,认为人的存在并不是理性主义时期人本主义者所认定的那样,是抽象的、物质化的、无历史性的、无时间性的存在者,而是一种生存性的存在者,是历史关系中的具体的存在者,是一种时间性中的“此在”。人的这种特性证明着人只能是与历史相统一的存在者,人所有的本质、价值、尊严和意义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得以发生和实现的。存在本体论者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中的主体进行解构,并终结了西方近代哲学中主、客二元论和本质主义视野下的人的概念和人的形象,即实体化、物欲化、原子化和理性化的人的观念的死亡。

统观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论哲学,其共同的价值取向显然是:把个体性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基点。他们对传统哲学关于存在的研究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们看来,以往哲学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没有抓住“存在”这个根本问题,或者对存在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他们主张从人本身的存在出发去理解存在及其意义。其次,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揭示是存在论哲学的重要特点。它从揭示人的存在情态出发,认为只有人的心理体验和纯粹意识才是人的真正存在。再者,存在论哲学表现出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和超越态度,他们普遍否定了实体本质论的理论形态,汲取了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把人的存在还原为先于主、客二元,心、物分离的纯粹意识活动,主张回到本源同一性的存在中去。于是,人的超越和自由成为其共同

主题。

由此观之,从19世纪的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哲学到尼采、柏格森等的狭义生命哲学(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亦可视为广义的生命哲学)直至20世纪初由胡塞尔的现象学引导并开启的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本体论,正是这一非理性主义人本思潮的生成、衍发、演化过程敞开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方向,并形成了“存在主义”的知识话语构建。而存在主义作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思潮,一方面反映和表征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状况,言说了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状态的抗议以及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力图超越西方传统哲学对人的存在的理性主义的理解方式,把人的存在从本质论和认识论的遮蔽下解放出来;它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反省,表现出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并在某种意义上拨转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当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标示着中国文化和文学实际上已步入“世界性”和“现代性”进程后,无论是作家的主体精神结构还是作品的审美形态结构都与传统文学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体现出一种“影响的焦虑”,即鲁迅所谓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情况往往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所出现的文学新现象大都对应着某种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一种严肃的哲学总是既有现实性又有超越性,即使是一种唯心主义、主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只要它确实严肃地触及特定的历史实际而又深刻地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哪怕它的提法是片面的,回答是不正确的,——这就仍然无害其为真正的哲学,就对人类永远具有启发意义。存在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哲学。”“存在主义的某些核心问题——如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个体如何达到本真的自我获得完美而丰富的存在?以及生命、死亡、自由、孤独等对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是一些古老而常新的人本问题,是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对人类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意义。而存在主义则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上,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强度重新提出了这些问题,作出了深刻、严肃和独到的解释,这就不但会在西方人士中引起热烈的反应,也会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引

起某种程度的共鸣和反应。”^①

须知,文学是“关于存在的诗性沉思”,^②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存在状态对文学来说具有本体论意义,这也就是所谓“文学是人学”的真正涵义。“五四”前夕周作人的《人的文学》(1918年)的发表就基本具备了非理性主义人本思想的底色。尽管周氏的“人的文学”的内涵也包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学观念,但其中明显地展现出非理性主义人本思想的质素。因为他所说的人并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而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周氏进而反对传统的灵肉二元论:“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人的文学”并非世间的“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人的文学”又可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而“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作者的态度,即以人的生活为是还是以非人的生活为是,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强调神性与兽性的统一是其人学思想的核心。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的类似表述:“存在主义,如我们所见,企图把完整的人——整个日常生活场景里具体的个人,连同他的全部神秘性和可疑性——带进哲学。”^③在此,非理性的欲望从非法走向合法、从幕后走到台前。它不仅意味着传统理性的解体,更重要的是它昭示着中国以非理性主义为根基的人本主义文学的来临。

“由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到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进而到对人的野性的呼唤,并以此作为对衰弱的国民性和民族性的更新与改革的措施与

^① 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241页。

^②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③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办法,这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人学思想的必然发展……传统文化中所要竭力征服的‘野性’成为现代主义作家们重振民族雄风的理想,‘狂欢’成为完善人性的最佳途径。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对欲望的肯定与张扬,表面上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简单否定,使人处于一种失范状态,使中国文化处于一种混沌无序状态,实际上它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人格心理结构,建立了现代的、新型的精神人格,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西方先进的精神世界相衔接,使中国的新文学与西方新生的现代主义文学接轨。”^①所谓“西方新生的现代主义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特指。

实际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可由波德莱尔、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溯到尼采、易卜生和克尔凯郭尔,其“现代性”的标志是以审丑的“矛盾性”反讽来表达审美的“解放性”精神。它凸显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文化危机,表现了现代人精神异化的存在困境以及克服异化获致精神解放的文学诉求。“事实上在西方学者那里,他们普遍认为现代主义小说中都具有存在主义的主题或者影响,‘一方面,存在主义这个词指的是某些文学作品的内容’,‘另一方面,实际上几乎所有现代文学都越来越走向探讨人的存在,而不是说明生活’,‘卡夫卡或贝克特不是存在主义者,但是他们同萨特都是从同一根源出发探索的……要是把《恶心》这样一部作品同卡夫卡或贝克特的小说创作作一对比,事情就很清楚,本体论的想象比存在主义的论辩对文学创作更为适宜’。也可以同样说,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形象和想象的方式对现代人关于存在的观念进行表现,它本身就孕育着更为形象和直观的存在主义哲学。这一点,国内的学者也持相似的看法。”^②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现代西方非理性文学思潮对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原初性、内在性、整体性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期,现

^① 吕周聚:《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人学观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② 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代非理性文学思潮作为一种强大的异域文化力量,就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过程,非理性文学就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结构性存在……非理性人本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一种外来异域思想,对 20 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时期,即五四时期和新时期……非理性思潮虽然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起伏消长的历史流变,但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原初性精神结构,却从没有完全灭迹过,它顽强地生长在现代中国文学的肌体上,非理性文学虽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产物,但它已成为 20 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本原性、精神性存在。”^①

对问题的进一步审视可以发现,非理性人本主义中的“非理性”在本质上与“审美现代性”有意义互洽关系。

“审美现代性的出现,无论作为抽象理论话语或感性的艺术形态,都是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分化的产物。韦伯的社会学分析突出了这一命题,而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命题。”^②显然,现代性具有社会学与人文学两种不同的涵义。前者指称的现代性主要是社会之制度功能的现代化,即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领域制度变迁的现代特性,它以社会结构功能的“理性化”为基本特征;而人文学意义的现代性则意谓人文世界之精神价值的现代化特征,在西方主要指称工业革命以后作为浪漫主义之后裔的现代文艺、美学、哲学运动的基本特性,它以表现人的生存困境、探索人的精神自由和创造性为鹄的。在此意义上,文化现代性不啻为审美现代性。

以制度功能的理性化变迁为前提的社会现代性,与立足于精神价值的解放性诉求的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现象的两个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维度。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源于科学世界观与审美世界观的不相容,它表征着现代西方文明的社会进步与人之发展的互否性困境。诚如麦克法兰所言:“‘现代性’概念中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机械的和直观的世界观。用怀特海的话来说,‘19 世纪文学……证明人类审美直

^① 朱德发等:《非理性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北方论丛》2003 年第 4 期。

^②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20 页。

觉和科学结构之间的不和谐。’”^①理性的科学世界观与非理性的审美世界观的对立呈现为实证与非实证、分析与直觉、客观与主观、逻辑与无理性、绝对论与相对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决定论与非因果性的矛盾。这种科学世界观与审美世界观的紧张，即利奥塔所谓“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的悖谬，其在哲学中则表现为所谓“系统哲学”（笛卡尔）与“教化哲学”（尼采）的冲突。

问题还在于，现代性的分裂源于人类精神结构中社会性与个体性、理性与非理性的深刻冲突。社会现代性最大的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人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西方现代思想家尤其是存在主义者对此有许多概括：尼采称之为“上帝之死”的时代；荷尔德林称之为“贫困的时代”；海德格尔称之为“无家可归”、“技术的时代”、“悬于深渊的时代”；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的时代；福柯称之为“人之死”的时代。他们对现代理性化世界的抵制是显而易见的，并通过审美现代性致力于对人的理想状态予以发掘：海德格尔希望诗人为存在“去蔽”，以使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马尔库塞寄希望于从根本上改造“感性”并通过“爱欲”达到“人的解放”；福柯则通过他倡导的“生存美学”来获得人生的自由与自觉。简言之，审美现代性寄希望于感性、非理性对无节制扩张着的理性的反抗。两种现代性的对峙颌顽，构成了恒久困扰人类的“现代性悖论”。

正是在两种现代性的张力性格局中，审美现代性发挥着不可取代的独特功能：它是在美学或艺术领域对人的情感、本能的强调，即所谓“审美的学科具有一种与理性的秩序相对立的感性的秩序，当进入到文化的哲学时，这种观点旨在于去解放感官”^②。同时又包含着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批判乃至否定。可以说，审美现代性实质上指陈的是这样一种思想艺术特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它通过强调与科学、伦理相

^① 参见[英]马·布雷德伯里等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② [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3页。